

2301

山城文史資料

第九輯

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

少城文史资料

第九辑

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成都

少城文史资料（第九辑）

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 编

（成都市王家塘街49号 610031）

内部准印证成都市第2862号

成都市红帆印刷厂印刷

厂址：成都市文家巷

月本32 印张5 字数103千字

工本费 3.50 元

目 录

少城早期传播马列主义的场所

——我们的书店 张先翥 (1)

浴血一战进伏牛

——红军战士程新芳忆独树镇战斗 王 涛 (3)

一门忠义 两代红心

——纪念薛特恩烈士殉难 56 周年 张先翥 (6)

西南军大川西分校的概况及其演变 曾广文 (10)

建国后成都市西城区对小商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于笙陔 (19)

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回顾 陈治儒 (26)

六百国民党将官南京哭陵记 黄子常 葛 森 (31)

追忆四川军阀暴戾摧残巴蜀教育事业和疯狂镇压进步师生

史实 葛 森 (36)

旧成都的烟毒一瞥 肖慕良 熊志敏 (41)

“菊乐”在改革中前进 曾慧琳 (49)

一个过得硬的乡镇企业

——记清江汽车挡风玻璃厂十年创业 徐稀星 (55)

成都市果品批发市场之今昔 廖如海 肖慕良 (58)

漫谈成都茶馆 熊志敏 (63)

会府市场今昔及废旧物资一条街的形成 范裕臻 (68)

成都名特小吃琐记 (续) 曾成志 熊志敏 (75)

汉族教授夫妇赴藏办学记 魏 克 (79)

成都市十三中学校史简介（下）	张志英（86）
全国第一所省属针灸学校剪影	张慎沅（93）
忆建国初期成都市的街道业余文化学校和大规模的扫盲运动	米庆云（98）
记肇闻补习学校兼谈解放前成都的私立补习学校	谭明礼 朱之彦（104）
忆四叔戴季陶	戴永芳（111）
成都的“五老七贤”	邓穆卿（116）
近代四川佛教教育事业概述	李豫川（120）
我所了解的成都二仙庵	杨锡民 原著 王大炜整理（126）
当代丹医家张觉人	李豫川（140）

少城早期传播马列主义的场所

——我们的书店

张先翥

20年代末期在成都居住过的青年学生都还记得，当时在祠堂街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附近（今市医药公司正对面）有过一家特殊的书店，店名是“我们的书店”，但倡议、筹划、集股创办这家书店的人是谁，却鲜为人知。他就是成都人熟悉的，创办《大声》周刊疾呼抗日救亡，为建立新中国而英勇奋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重庆渣滓洞的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之一的车耀先烈士。

在当时，“我们的书店”这个店名不仅很引人注目，店招也很特别创新，不是流行的由名人书写的黑色退光油漆的金字招牌，而是镌刻着一位不知名的青年书写的仿宋体美术字，长条形，白底、蓝边、蓝字，从左至右横排的“我们的书店”几个大字的招牌，看到这个招牌就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们的书店”所指的“我们”是谁呢？据说，1928年车耀先在上海出席“基督教东亚区大会”时（车耀先早年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与杨伯恺（成都十二桥牺牲的革命烈士）等几位四川同乡倡议办书店时就明确提出：书店所售书籍、刊物读者对象是社会进步青年和大中学校师生。书店购进、出售的书刊应是当时成都市面上买不到的社会科学书籍，包括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作家的小说、诗歌、翻译作品、期刊等。

1928年夏，“我们的书店”开业后，引起了当时成都市的大、中学校和追求进步的社会青年的极大关注，成为书店的主

要顾客。书店采用开架售书的方式，书刊任由顾客翻阅、选购，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店堂，每逢星期天总是挤满了人。值得一提的是，书店只有一位叫曾慕琴的店员，每逢新书一到，他就首先阅读，对来店的人，无论买与不买，他都主动向他们介绍书刊的内容，受到购书者的欢迎，笔者还多次看到当时任成都大学校长的张澜先生来书店选购书刊，并与店员亲切交谈。书店还开办了租书业务，读者交少量押金租金即可在书店租到喜爱的书籍，这在当时是一项创新。

“我们的书店”开业不久，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扼杀，他们收缴了一批又一批的进步书刊，最后使用了查封书店的卑劣手段，时间约在1929年秋：“我们的书店”的存在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却给人们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同时，在她的带动下，后来在祠堂街先后开设了“现代文化服务社”、“开明书店”、“北新书店”等进步书店，以及抗战期间开设的“生活书店”、“新华书店”等近十家书店，形成了30年代成都市的“文化街”。

“我们的书店”的创办和她的活动，只是笔者少年时代得知的一些粗略情况。时间已过去60多年了，书店和党的关系怎样？尚冀知其详情的老前辈能为史刊提供更多的史料。

浴血一战进伏牛

——红军战士程新芳忆独树镇战斗

王 涛

程新芳，安徽省六安市人，1931年8月入伍，曾随红二十五军经历过长征，离休前系成都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前不久，他应笔者的邀请讲述了他在长征途中一次难忘的战斗——独树镇战斗。程新芳虽已年逾古稀，但体魄健壮，思路清晰。这次战斗时间虽不算长，但却关系着红二十五军的生死存亡，所以，事情虽然已经过去60年了，但他仍记忆犹新。

红二十五军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以后，由留在那里的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部队为基础组建和发展起来的。1932年11月30日，红二十五军正式成立时，下辖两个师（5个团），加上军直属队共有7000多人。它是活跃在鄂豫皖苏区的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从鄂豫皖根据地开始的。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以后，遵照党中央指示和中央鄂豫皖省委的决定，于11月6日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大旗，从河南省光山县誓师北上，开始了伟大而又艰巨的长征。红二十五军首先越过平汉铁路进入鄂豫两省交界的桐柏山区。但由于这里地形狭小，难以发展，便决定离开该区向河南省西南部的伏牛山区挺进。独树镇战斗就是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区之前与敌军的一场浴血鏖战。

独树镇位于河南省方城县东北许（昌）南（阳）公路上。

红二十五军打算从这里进入伏牛山区。11月22日，红二十五军离开桐柏山区以后，逶迤西进，一路过关夺隘，宣传抗日，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于26日午后1时许到达独树镇附近地区。不料全军在这里竟遭到了蒋军第一一五旅、骑兵团以及地方土顽部队的围追堵截。敌人先期以重兵封锁了公路线，继以优势兵力、优良武器装备，占据有利地形向我军发起猛烈冲击。这时我红二十五军仅有3个步兵团（第223、224、225团）和1个约百十人的手枪团，全军不足3000人，并且是经过长途转战，远道而来，形势对我极为不利。但红二十五军毕竟是一支党领导下的、久经战火冶炼的英雄部队，战斗作风勇猛顽强，有很强的应变能力。自战斗打响以后，全体将士在军首长指挥下，迅速就地展开，以村庄、田坎、坟包、小丘为依托，临危不惧，沉着应战，反击敌人。这天，气候非常恶劣，寒流袭来，北风怒吼，风雨交加，我军将士衣裤单薄，饿着肚子，俯卧在泥浆里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拼搏。有的战士冻得手脚麻木，拉动枪机都很困难。当时，程新芳是第225团卫生队的一名看护员，他在卫生队长李永春带领下，奔前跑后，奋不顾身地抢救伤员，身上背的绷带、碘酒全用完了。许多伤员不下火线，拒绝包扎，把绷带让给战友，自己仍躺在血泊里坚持战斗。

在采访中，程新芳说，在战斗中，我最敬佩的是各级领导干部，象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等同志，他们的生活条件完全和战士一样，但吃的苦多，受的累大。他们和战士天天滚在一起，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打起仗来，哪里战斗激烈，他们准在那里。他们勇敢沉着，指挥若定，不断叮嘱大家：“沉着！”“顶住！”“坚持到天黑就是胜利！”不管战斗进行得何等残酷，形势多么险恶，只要看到他们手提大刀、威

风凛凛地在阵地上一站，那就是信心，那就是力量，那就是胜利的希望！当时，我不过是一个十三、四岁的红小鬼，是他们亲手把我从长征路上拉扯过来长大的。今天，我是个幸存者，应该继续完成他们未竟的革命大业，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红二十五军在独树镇地区整整抗击了七、八个小时，击退了蒋军多次进攻。当夜，我军乘夜黑、风急、雨骤，不顾饥饿、疲劳，带着伤病员，从敌人结合部的缝隙处杀出重围，越过公路，进入了伏牛山区。后来，红二十五军长途转战经陕、甘、宁诸省区，终于1935年9月16日在陕北延川县永坪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历时十个多月的万里长征。

一门忠义 两代红心 ——纪念薛特恩烈士殉难 56 周年

张先翥

薛子芳与其子薛特恩，30 年代在成都理发业中首创并推广新式发型的事迹，以往在《成都理发业话旧》的文章中有过一些记述，而他们在爱国反帝、抗日救亡斗争中所作的贡献，由于薛特恩被捕后杳无音讯，因而湮没无闻，鲜为人知。今年是烈士殉难 56 周年，为表彰忠义、激励来兹，笔者谨将所见所闻公诸于世。为便于说明原委，并将其父子生平，简陈梗概，以飨读者。

薛子芳，四川简阳县人，清朝光绪年间，其少时随父学会剃头手艺，后来给一位叫叶大人的官员当佣人，随叶去南洋，并在那里学得新式理发技术。民国初年回国后，在陕西街基督教会的福音堂门前设摊理发为生。当时的成都只有他会用推剪理发，喜欢新式发型的华西坝教会学校的学生都进城请他理“拿破头”。薛子芳是基督教徒，在一些教友的资助下，在陕西街福音堂斜对面（今十中校右侧）租房开设理发店。开初是没有招牌的，30 年代初由教友陈配田为他写了孩儿体的大字招牌——“薛子芳理发店”，在他儿子薛特恩的设计下装修店堂，添置理发座椅、镜片、风扇（用十多把芭蕉扇拼成的）等设备，店堂清洁卫生，迎来更多顾客。

薛子芳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为人正直，对该教会内部许多黑幕深为不满。1931 年夏，共产党员车耀先、陶宗伯（他们都是基督教徒）等联合基督教美以美会的教友，发起组

织以“收回教权教产，华人自主教会”为宗旨的爱国反帝团体——“成都市中华基督教改进会”（会址在原陕西街福音堂），薛子芳积极参加活动，负责该会有关教产、财务等方面的工作，先后提供了不少为会外人不知道的外国传教士把持下的基督教会，利用传教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刺探我军事情报，收集我国地下资源材料等种种罪恶勾当。

薛子芳一生勤劳俭朴，除理发、教子外，其余的精力和时间均投入爱国、爱教、反帝的活动，积劳成疾，不幸于1938年逝世，享年78岁。

薛特恩，1914年出生于成都市，幼年随父参加基督教会，小学毕业后，转到基督教会办的高琦中学就读，只读了一学期，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供给他读中学的费用，有人劝他接受基督教会的“帮费”（即“助学金”，教会称作“帮费”）把中学读完。但他得知接受“帮费”的学生毕业后，要听从外国传教士的支配，为他们出力效劳（当时人们叫做“当洋奴”），他不愿接受教会的“帮费”，毅然放弃了继续读书的机会。辍学后，一面自修中文，一面随父学得一手新式理发的好手艺，并培养了一批技术高超的理发师。

“成都市中华基督教改进会”成立后，当时不到二十岁的薛特恩积极参与了这一爱国反帝活动，成为这个组织的中心活动人物之一，担负起组织反帝宣传工作的任务，并参与“成都市中华基督教改进会”出版的、以刊登揭露英美帝国主义者利用基督教会对我进行文化侵略种种罪行的期刊——《改进》半月刊的编辑、发行等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成都市中华基督教改进会”成为成都市反帝团体的主力之一。当时，薛特恩几乎放弃了理发工作，投身于成都市轰轰烈烈的反日运动，起草反日宣传品，油

印反日传单，组织宣传队伍，上街游行示威。

为了普及民众教育，1935年薛特恩又与车耀先、张良卿、卢剑波、郭霞轩、张仲翔等发起组织“四川注音符号促进会”，推行注音符号，扫除文盲，普及民众教育；为推广“世界语”，薛特恩还参与了编辑出版《语言》杂志，倡议文字改革等成人教育活动。

1936年震惊中外的双十二“西安事变”期间，薛特恩与车耀先同志每夜守候在车家的收音机旁，收听西安电台播发的消息，立即复写多份分送给关心事态发展的各方进步人士，让他们很快了解到当时报纸上看不到的“西安事变”真相。与此同时，薛特恩还积极协助车耀先同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发起组织“成都市各界救亡联合会”，筹组出版《大声》周刊，大声疾呼“对内和平，对外抗战”。

《大声》周刊于1937年1月17日创刊，编辑人为车耀先，发行人为薛特恩。《大声》周刊出版到第13期即遭到国民党当局查封。但他们并未因此退却，旋即改名《大生》周刊，出版到第5期又被查封，后又以《图存》名义出版，也只出版了3期还是被查禁停刊。“七·七”抗战后，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大声》复刊，但出版到1938年又被迫停刊。

《大声》、《大生》、《图存》等期刊的出版发行，及时给社会各界传递抗日救亡的有关消息，发表的不少抗日救亡文章，对青年鼓舞很大，不少青年在她的影响下投身革命洪流，奔赴抗日前线，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在编辑出版《大声》等三个刊物期间，薛特恩除为刊物写稿外，并主编“一周展望”、“战情展览”、“时事述评”等专栏，并为三个刊物的组版、校对、发行等工作付出辛勤的劳动。

由于薛特恩同志遵循党指引的抗日救亡的道路，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也就成为国民党反动政府镇压的对象，被秘密监视。1940年3月16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车耀先、罗世文同志的同时，从陕西街“薛子芳理发店”抓走了薛特恩同志，此后即杳无音信。事隔23年，1963年5月11日，据军统川康特区特别组长刘崇朴书面交代：“1940年5月下旬一天深夜，我和周作桢等特务用汽车将薛特恩、洪希宗、唐鉴予、胡芷浒四位共产党人载到龙泉驿半山腰预先挖好的坑前打开手铐，用绳索捆绑手脚，然后将他们扑倒在地，用绳索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左右拉绞，几抽几放之后腹部隆胀起来。然后用尖刀戳入小腹，鲜血随刀飞溅，气绝之后，推入坑内，撒上石灰，覆土掩埋。”（见中共成都地方党史资料丛书《抢米事件》第109—110页）。就这样，薛特恩同志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魔掌之下，时年仅二十六岁。

西南军大川西分校的概况及其演变

曾广文

1950年元月，我从成都北较场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随营学校学习（后该校改为川西军大），同年7月提前毕业，留在四大队六中队任文书。回首军大这段学习生活，令人无限留恋，无比珍贵，因为这段生活铸造了我们的政治生活，使我们永葆政治青春。二野军大校史研究会成立以后，很多同学都在用自己的笔来描写这段生活，希望留下这段美好的回忆。下面就是我所回忆到的一些情况，望能对后人有所裨益。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事政治大学川西分校（以下简称川西分校）诞生于1950年春，正式命名的文件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西军区司令员张祖琼、政治委员李井泉、副司令员白天、第一副政委袁子钦、第二副政委桂绍彬署名下达的，时间是1950年6月5日。

川西分校的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随营学校。1949年底，随营学校随军入川，校政治处主任张卓之奉命参加了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任陆军处长。

12月25日，以李永中、肖平波为代表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成都附近的郫县宣布起义。28日，张卓之偕同随行的军事代表到郫县同起义师生会面后，向大家分析了形势，帮助大家稳定情绪。随后即率之共赴随营学校校部所在地新都。

陆军军官学校最早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由国共两党合作兴办的一所革命军事学校，因校址设在广州市黄埔岛，又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到1949年23期结业（24期学生正人

校)，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随营学校所接受。

在郫县起义的在场师生主要是 23 期 1、3 两个总队。分散在附近的 2 总队和部分 24 期师生于 1950 年 1 月 6 日以后，也纷纷到新都归队。

此外，来校参加学习的还有 60 军、61 军、62 军和 18 兵团送来的千余名尉级以上军官，有川西地区其他投诚、起义部队的 5000 余名军官，有湖北省联合中学的千余名“流亡学生”。1950 年 6 月，西康军大又调来 4 个大队。至此，川西分校学员的人数总计在 3 万人以上。

18 兵团随营学校于 1950 年 3 月宣布改为川西分校，陆续任命的干部有：校长张行忠、政委吴西、副校长杨晒轩、政治部主任张卓之、教育长张刚剑、副教育长沈铸东。

学校设校部、政治部、后勤处三大机关。校部辖 3 科：军教科（副科长杨锡洪）、队列科（科长苏龙、副科长张占勋）、管理科（副科长刘元道）。队列科下有警卫连、通讯队、油印组和收发室。政治部辖 5 科：组织科（科长张振声、副科长熊志信）、宣传科（副科长洪流、柳进）、保卫科（科长刘世泰）、直工科（科长邵荣禄）、总务科（副科长樊仁中）。组织科下有巡视组。宣传科下有妇女子弟学校、政文研究室（主任任伯金）、教学报社、文工队（队长张高峰）和女生队。总务科下有家属招待所。后勤处（处长徐厚银、副处长施得宜、副政委王子修）辖财粮、审计、军需、医政、保健、军药、供管 7 个股和门诊所、医院。军需股下有运输连。

全校有 7 个学员大队和两个教导团。一大队大队长兼政委祝永茂、副大队长程定、副政委马俊杰、政治处主任苗长庆、副主任吴光照；二大队大队长兼政委熊明发、副大队长张海、政治处主任李炳光、副主任王彪；三大队大队长兼政委袁本

慧、副大队长李辛酉、政治处副主任张振家；四大队大队长秦承益、副大队长田有信、副政委孙毅民、政治处副主任张文华、魏传道；五大队大队长、政委缺、副大队长史金、吴景起、政治处主任王静心、副主任李旭分；六大队大队长、政委缺、副大队长钟德炳、政治处副主任常恒裕、望见；七大队大队长王愚堂、副大队长安成佛、政委朱辉、政治处副主任刘保训；教一团团长李振东、政委何晓光、参谋长王俊峰、政治处副主任郑克让；教五团团团长苏新、政委关磊、参谋长翟福顺、政治处主任鲁治光、副主任仇明林。

当时，大西南战役基本结束，国民党部队约 90 万人已被歼灭（包括起义和投诚的），但国民党部队的残余尚未完全肃清。2 月 5 日，成都市郊的石板滩、龙潭寺一带发生匪特暴乱，我军第三整编委会 178 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及其随行军代表和警卫战士行经该处，不幸遇害。新都城区匪特公开携枪出入，甚至扬言要攻城。在匪特煽动下，人民币贬值几乎近于不能使用，我们一度不能采购市场食品，只好煮苕菜下饭。所以，开学初期，学校是很不平静的。我所在的中队，就曾为此而挪动过营地。校内谣言也很多，有的学员害怕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害怕原子弹，思想波动较大；有的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有的则对自己的前途、对共产党抱有怀疑。少量学员便不辞而别，或者回了家，或者辗转流入台湾。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保证学员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学校先后抽调 40 余名干部帮助新都、广汉进行清匪反霸工作，消灭土匪 200 余名，并与新都县政府合作，侦破并惩处了罪证确凿的匪特和暴乱分子。

随着匪患的逐步平息和敌特的被清除，社会生活日渐恢复正常，学校教学工作也开始步入正轨。教学生活虽然步入正